

华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交流

——马来西亚文化融合的表现

(马来西亚) 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学院 马来西亚 43400)

[关键词] 华语; 马来语; 词汇借用

[摘要] 马来西亚是语言汇聚的国家, 在各大族群语言中, 以马来族群和华裔族群的语言接触最为明显。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华语和马来语的借用研究, 采用比较的方法, 进行华语借用马来语词汇以及马来语借用华语词汇的双向探讨。调查发现, 华语和马来语之间的词汇互借有许多共同点, 不但比较集中在闽南语和马来语, 而且词汇类型也以生活化的事物名词为主, 这是两种文化在复合型社会中自然交流的具体反映。

[中图分类号] H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099 (2009) 01 - 0084 - 05

Analysis on Words Borrowing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Malay Language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Malaysia

(Malaysia) ANG Layhoon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43400, Malaysia)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Malay Language; Words Borrowing

Abstract: Malaysia is a region of language convergence. Among them, the language of Malay ethnic and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ethnic make the most obvious contact. With reference to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looks further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d borrowing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of many aspects in words borrowing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These similarities are mostly on Malay and the Minnan dialect of Chinese, on the common nouns used in daily life. Therefore, it is proven that Chinese culture and Malay culture have been interacting in a natural and harmonious manner in the compound society of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 不同文化相互交流、适应, 相关的语言也相互接触、影响。其中, 马来文化和华人文化的接触是明显可见的, 因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当大。语言接触和社会生活在语言上的反映往往首先是词汇变化。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元素, 跟社会生活联系最密切、最常见的语言接触现象是借词的产生。借词又叫外来词, 是某种语言中掺杂的外来语成分, 可以从中窥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民族之间的关系^[1]。

一 学术回顾

关于马来语和华语 (包括华人方言) 相互借用方面

的研究并不多, 相对集中在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研究, 而且注重借词的分类。一些当地学者早期就已经注意到马来语和华语借用的问题。梅井在 1963 年提出了华语和马来语的交流现象^[2], 而亚都拉则在 1974 年进行马来语的外来词探讨时提到华语借词的存在^[3]。比较近期的研究也有一些, 如杨贵谊认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福建话的日常用语中经常出现马来词语, 其丰富的程度居于其他华人方言 (如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等) 之首^[4]; 苏庆华发现马六甲青云亭古庙中的记录簿也有源自马来语的音译词^[5]; 马书迪和杨亚禄则从语法的角度, 探讨闽南语和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在语音、词汇结构以及语义上的差异和变

*[收稿日期] 2008 - 03 - 31

[作者简介] 洪丽芬, 博士,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学院讲师。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以“华语”为主, 但是许多华人也会说英语和马来语。广义的“华语”应包括“华人方言”, 在下文中, “华语”取狭义, 指马来西亚华人所使用的, 具有当地语音、词汇和语法特色的汉语, 是跨各方言群的华人语言, 而“华人方言”则指华人所归属的语言, 比较常见的有福建话 (即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潮州话和海南话, 都各具有语音特色, 与华语的语音差异也颇大。

化^[6]；周福泰在探讨华人和马来人的文化交流时也提到马来语言中的华语借词是文化交流的明证^[7]。除了当地学者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两种文化的语言交流。孔远志就将马来语（包括印尼语）中的闽南语借词进行统计并分成11类：蔬果、日用品、风俗习惯、数量词等^[8]；周长揖也实地考察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闽南语，认为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是其当地化的表现^[9]。这些研究都说明华语融入当地语言的实况，而两种语言互借是当地文化融合的反映。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语和马来语交流、相互借用的特点。

二 华语与马来语词汇交流的历史背景

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早在16、17世纪就已经开始，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私人海外贸易和华人移民。当时海上运来的商品种类非常多，有日常生活用品、手工业品、食物等，而移民则以劳力为主，多从事手工业、农牧等行业，所以马来语引进的华语词汇也以这些方面的词汇居多。华人移民到马来西亚谋生，把华语带进马来语的国度，为华语词汇进入马来语提供了机会。

过去，华人在马来群岛没有进行政治活动，主要活动是为个人谋生、经济活动。因此，马来语和华语的交流是自然的，没有特殊的推广，也没有具体的鼓励，而是通过生活上的交往、杂居和通婚，互相交流。因而，马来语中的华语外来词，是通过华人的方言口语输入的。华人与马来人交往，在口语方面尽量学习马来语，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会用自己的方言顶替，由此形成语言混杂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并非通过政策高压手段进行。在日常生活接触、自由联姻与和平相处的情形下，华语词汇自然地就被马来语所吸收。同时，马来西亚的华语也吸收了一些马来语词汇，这是其他各种外来语言所未曾有过的现象，在两国的文化和外交关系上，意义可贵。它们相互吸收的词汇也往往具有丰富的地方色彩，与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从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当地文化对华人文化的接受；相反的，从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也可以看出华人文化对马来西亚当地文化的适应。华语和马来语的交流是早期当地住民和华人移民接触和密切联系的佐证。

三 华语与马来语相互借用的种类

马来语和华语词汇的交流有其独特的方式。狭义的借用方法主要有四种，下面以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为例分别说明。第一种是音译，即把借入的马来语词按其原有的马来语音形式，用汉字转写出来，而汉字并不表示意义。例如：马来语 laksa 音译成“叻沙”。这是一种马来西亚道地小吃，属面条汤类，以碎鱼肉为佐料，味酸辣。第二种是部分音节音译，部分音节意译，使人易于理解。例如：

“槟榔屿”即马来文中的 Pulau Pinang, Pulau 是“岛屿”之意，Pinang 是“槟榔”树，属音译。第三种是音译加注释，以说明事物类别。例如：“巴冷刀”即马来文中的 parang, 是一种比较阔的长刀，一般用来砍树开路，属音译，“刀”字是另加上去，以更好地说明其意思；“巴菇菜”中的“巴菇”音译自马来语 paku, 一种野菜的名称，“菜”点明了借词意思。第四种是音义兼译，即选择音译的音节时也照顾到词义。例如：“红毛丹”即马来文中的 rambutan, 是一种表皮红色多毛的热带水果，大如鸡蛋，这种译法译得色彩皆俱，而且“丹”字也与音节 tan 对称；又如“烈火莫熄”即马来语中的 reformasi, 是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的政治口号，本来借自英文中的 reformation, 意指重组体制或改革，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将之音译成“烈火莫熄”，隐含口号本意，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安华政治斗争之激烈。广义的外来词还包括意译词，如马来人的日常食物 nasi lemak 译为“椰浆饭”，nasi 指“米饭”，lemak 指“椰浆”。本文采用的是狭义借用方法的外来词，因为这种外来词表现形式比较分明，争议性少。

四 马来语借用华语的特点

在马来语和华语词汇的交流中，关于马来语吸收华语借词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华语借词中，以闽南话词汇占大多数，其他华人方言所占成分非常少^[10]。迄今，关于马来语中华语借词的研究并不多，而且，由于统计的年代和所采用的文本不同，造成各种研究的统计数据都不一样。根据1974年的一项统计，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有279个，在众多来源语中排名第四^[11]。然而，根据1985年一项对8本印尼语和马来语词典的调查统计，马来语中有511个华语借词，在511个华语借词中，借自闽南方言的有456个，占89.2%^[12]。如果将印尼语、马来语的报刊、文艺作品和词典中的华语借词都加起来，则至少有1046个^[13]，其中源自闽南话的词汇有954个，占91.2%^[14]。闽南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方言群，居住在以马来人为主的州属，如吉打、玻璃市、丁加奴和吉兰丹^[15]。所以，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占华人方言借词之冠是可以理解的。根据1989年在槟城进行的实地调查统计，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有341个，尚活跃的只有90个（占26.3%），其中88个是名词，2个是动词^[16]。2002年，在另一项对马来西亚的3本权威马来字典的调查中，经逐字统计，发现收录并注明是借自华语的词汇只有224个，其中193个是食物、衣物、用品、交通、环境、宗教等方面的名词，31个是数词、形容词和动词^[17]。这些借词中，75%源自闽南方言，7%源自其他方言，18%不能确定来源语。在有关调查的实地访问马来人部分，查证出马来人明白词汇意思并仍使用的汉语借词只有61个，占27.2%，其他的都不为马来人所知。跨入21世纪，马来人很少使用大多数华语借词的趋势反映了马来文和华文脱

钩。与此同时,马来文中的英语借词数量飙升,这意味着当地华人文化对马来语的影响式微,不敌全球性英语化的强劲趋势。

第二,闽南语借词多,反映了闽南人与马来人密切交往的关系。当地的华人大多数来自闽粤,但闽南语的流通性却比粤语强^[18]。这与闽南人所占的优势条件有关。第一,近几百年来,马来西亚的华侨中,闽南人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是马来亚的开拓者^[19]。第二,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中,闽南籍占最多。因为漳泉籍侨胞到南洋谋生,不常归国,与当地华人关系更为密切。第三,闽南人在当地商业中经济力量比较大,尤其是零售行业,闽南人占了绝大比例,经营的范围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自然与当地华人交往更频密。第四,闽南人的作业和聚居都是在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区,影响力自然比居住在城外的其他籍贯华人大。第五,闽南人与马来人通婚的比例也比其他籍贯的华人高。峇峇族群就是闽南人与马来人的后裔,同化程度很高。这些客观因素促使闽南人学习马来语,他们掌握马来语往往比其他籍贯华人熟练。闽南语对马来语的影响也比较大。

第三,从词类来看,马来语里的456个闽南语借词中,名词占了约80%^[20],而且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名称,如食物、杂物,而非抽象名词,其余是数词、代词、形容词、动词、称谓词等。例如:

(1) 食物类: mihun (源自闽南话“米粉”)、longan (源自广东话“龙眼”)、misoa (源自闽南话“面线”)、tauhu (源自闽南话“豆腐”)。

(2) 用具类: teko (源自闽南话“茶壶”)、tanglung (源自广东话“灯笼”)、loceng (源自闽南话“钟”)、tong (源自广东话“桶”)。

(3) 其他日常用语: tokong (源自闽南话“土宫庙”)、kongsi (源自闽南话“公司”)、inlek (源自闽南话“阴历”)、kuli (源自闽南话“苦力”)。

第四,马来语中的华语词汇以华人文化色彩浓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词语占多数,反映了两种族群文化通过生活交往的自然融合。这些借词时常是指中国人、闽南人或华人生活中的特有食品、日用品、风俗习惯、亲属称谓、数量词、建筑与场所、游戏与信仰活动、人物名称、地名、航运等^[21]。例如: ongji (指旧时华侨居留许可证)、capjiki (指一种赌博)、ceongsan (指旗袍)。相反地,马来语中其他语言的外来词汇几乎都是带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名词,而且马来语中的英语借词多数与近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有关。例如: demokrasi (源自英语 democracy,指“民主”)、televisyen (源自英语 television,指“电视机”)、informasi (源自英语 information,指“资讯”)、teknologi (源自英语 technology,指“科技”)。

第五,在马来文字典里,有些华语借词并没有注明源自华语,是华语借词,这意味着它们已经完全融入马来语

中。例如: teh (茶)、cawan (茶碗)、tauhu (豆腐)、gongsi (公司)、singse (中医师)、mi (面)、bacang (肉粽)、kuaci (瓜子)、kungfu (功夫)、taiji (太极拳)、loteng (楼顶)、lngkang (沟渠)、semboa (珠算盘)、cincai (随便)、kuih (糕)、kana (橄榄)等。有一些词汇已难于辩认原来的华语字眼,仅能从其语音确认是属于华语。

第六,从吸收的方法来看,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大部分是根据华语发音。有些华人为了迁就华语发音习惯而出现音变的现象,尤其是 [d] 和 [r] 的发音,大多数当作 [l] 来发音,因为华语语音中没有马来语中的 [d] 和 [r] 音。年纪大的华人,发音习惯已经养成,多不习惯新音符,就以近音替代。例如: duit (钱) 念成 lui, durian (榴莲) 念成 liulian。虽然发音上有一些差异,字义上却没有不同。

第七,有些华语借词与原本的华语词义不完全一样。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国情与中国国情不同,更准确地说是在闽南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不一样。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义缩小或扩大,如 singse 在马来语借词里是指中医师,但是在闽南语里,词义范围还包括丈夫、老师等。二是词义转移,如 beca 在马来语借词中是指三轮车,但是在闽南语中,它原本是指马车。借用时,词义出现变化。三是词义引申,如 pecun 在马来语借词中是指端午节,它引申自“扒船”,即龙舟竞渡的风俗。四是词义色彩变化,如 cabo 在闽南语中泛指女性,是中性词,可是在马来语借词中,它却是指妓女,含贬义。五是词义的范围和程度发生变化。譬如, kiasu 在闽南话里是指怕输、怕失败,但是在借到马来语去后,通常指拼搏以求出线、斤斤计较,以免让别人占到便宜,范围和程度都不一样。

五 华语借用马来语的特点

在马来西亚,华语也同样在语言文化交流中借取马来语词汇。《南洋华语礼俗词典》所收录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日常用语中,闽粤词条最多,借自马来语的也有近40个,约占4%^[22]。据其他估计,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比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少,只有233个^[23]。这些数字显示了马来语对华语的吸收多于华语对马来语的吸收,可见马来文化对华人文化的适应比较多。主要原因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语言和文化相对丰富多彩,促使马来人接纳和吸收华人语言。以下简述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特点:

第一,华人方言中,以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最多。这与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数量成正比,更有力地说明了在华人方言群中,闽南人和马来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例子有: bas sekolah (校车)、kahwin (结婚)、mata (警察)。

第二,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多为日常生活词汇。从词义上来分,华语(主要是闽南方言)中的马来语借词可以分为9类:

(1) 饮食类: 如 sate (沙爹)、gado - gado (加多加多, 指一种杂菜)。

(2) 农产品类: 如 durian (榴莲)、langsai (冷刹, 指一种热带水果)、jagung (玉米)。

(3) 文娱类: 如 angklung (昂格隆, 指一种竹制乐器)、kompang (干邦, 指一种乐鼓)。

(4) 称呼类: 如 Datuk (拿督, 指封号)、Sultan (苏丹, 指马来统治者)。

(5) 日常用品类: 如 batik (峇迪, 指一种布料)、tongkat (东葛, 指拐杖)。

(6) 地区类: 如 kampung (甘榜, 指乡村)、kaki lima (五脚基)。

(7) 工商类: kedai (杂货铺)、pasar (巴刹, 指菜市场)。

(8) 动词: tanggung (当供, 指负责)、kahwin (交奩, 指结婚)。

(9) 其他: salah (错、犯法的); celaka (倒霉)、atap (亚答, 指一种植物, 早期当地房子都以其树叶为顶)、jadi (成功)。

第三, 有些闽南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原借自英语, 如: bus (巴士)、taxi (出租车)、pension (退休退休金)、sorry (对不起)、stamp (邮票)、form (表格)、bankrupt (破产)、tie (领带)、percent (巴仙, 百分比)。有一些则借自其他西方语言, 如 sabun (肥皂) 就是源自葡萄牙语。由于这些借词在马来语里很普及, 当地华人听得多了, 就一并将其转借过来。

第四, 从借用方式来看, 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绝大多数采用音译手法, 但有一些借词的语音和语义还是出现了变化。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大部分根据马来语发音, 但是多半会产生一些音调上的改变。譬如, 福建话中的“榜鼓”借自马来语的 bangku, 音调稍有不同, 但是意思不变, 指“矮凳”。另外, 少数的字义也略异于原来的字义。譬如, balai在马来语中是指厅、亭之类的建筑物, 但是在华语中, 已经引申为警署之意。

第五, 从词类来看, 名词性借词最多, 占 74% 左右^[24]。这点也与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一样, 可见马来文化和华人文化的交流是建立在生活和物质层面上的, 而不是精神、思想或宗教层面上。

第六, 有的马来语借词已收录进华语规范词中, 如“槟榔”、“纱笼”、“榴莲”, 这显示出一些马来语借词已经完全融入华语中。相比之下, 流行于华人方言尤其是闽南语以及客家话中的马来语借词更多。在马来语地区, 如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吉兰丹和丁加奴的华人社会, 使用的马来语借词则更多。换句话说, 华人方言中的马来语借词比华语普通话中的马来语借词更多, 使用率更高。

第七, 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虽然也出现在书面语中, 但是绝大多数用于口语。主要的语法特色是: 说话时, 动

词通常省略了书面语常用的词首和词尾, 只采用相应的词根。

第八, 住在不同马来语域的华人, 在华人方言中所说出来的马来语借词可能不同。这表示, 华人借用马来语主要是以当地的马来语变体为准, 根据自身需要而借用, 所以华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并不完全一致, 而是因地域或因人而异。譬如, 马来半岛东海岸吉兰丹州的华人所说的福建话, 因为掺杂一些当地马来语借词, 所以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的华人可能就听不懂了。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方言没有文字记载, 都靠口语流传, 因此要统一或规范华人方言中的马来语借词极其不易。

六 华语与马来语的融合

华语和马来语的交流, 除了双向的互借, 还有一种是马来语和华语相结合的形式。这也是外来词常见的结构改造方式, 种类包括部分意译、全部谐音音译或添加意义标志, 保留了双语的成分。这类词语数目不少, 例如以下马来语: kongsi gelap, 即黑社会或私会党 (kongsi即闽南话中的“机构”, gelap即马来语“黑暗”); kopi o, 即咖啡乌 (kopi即马来语“咖啡”, o即闽南话中的“乌黑”); kopi kao, 即浓咖啡 (kopi即马来语“咖啡”, kao即闽南话中的“厚”、“浓”)。闽南语中也有类似的结构, 如: mata liu, 即警察局 (mata来自马来语“mata - mata”, 指“警察”; liu即闽南话“寮”); sepatu e, 即皮鞋 (sepatu即马来语“皮鞋”, e即闽南话“鞋”, 这是添加意义标志的好例子); 医院则称为老君厝, dukun chu (dukun即马来语“巫医”, chu即闽南话“厝”、“房子”); 卖面包的小货车叫 roti qia (roti即马来话“面包”, qia即闽南话“车”); 马来神明 (即拿督公) 被称为 datuk gong (datuk即马来语“老者”, 闽南话 gong指“公公”)。这是都同化外来词的明证。

七 结语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无论讲印度话还是英语, 一般几乎不掺杂马来语词汇, 充其量只是一些特别名词或特殊的用字, 才应用到原来的马来语词汇, 如 melayu (巫来由)、sate (沙爹)、durian (榴莲)、ronggeng (弄迎舞)。这说明马来语虽然吸收了不少印度语和英语词汇, 当地流行的印度语或英语却未礼尚往来地吸收一些马来语常用词汇。相反, 当地的华语, 无论是粤语或闽南语, 多多少少都包含马来语和普通词汇, 特别是在马来亚联合邦内地, 这种情形更加普及——凡是日常的华语会话, 马来语词汇都占有相当的份量。这反映了华人语言比其他移民语言和外来语言更善于吸收, 以至于华人语言能够与当地的马来语融合, 而且是双方互借, 双向交流, 绝对不同于马来语和其他语言的单向借用。

华语和马来语中出现对方的词汇, 体现了两种语言的

文化融合。虽然这些外来的词语概念不同于原有概念,但既然这些外来概念通过语言反映,就一定是被人们所认识,所以具有人文的文化性质,是语义上的文化融合,正如史有为所说:“语义因素可以看成是语言和文化功能的反映。”^[25]此外,借词也体现出形式方面的语言文化融合。这表现在通过音系改造来同化外来语,主要是两方面:音译部分的读音改造和结构改造。所以,不论是华语被马来语借用,还是马来语被华语或闽南方言借取,总体上都是在语音和意义上服从于主体语言的音系,多多少少与原词有

所差别,是两种语言形式上的融合。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大部分已经从客居社群过渡到主居社群,华人社会使用华语受到当地语言环境的包围,在借词上反映出强烈的马来西亚色彩,这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正在融合于当地语言的社群。尽管如此,随着社会日益现代化,再加上马来语和英语在拼写上更相近,马来语逐渐转而借用英语词汇,从而相对少用华语借词。虽然一些华语借词还在马来社会中流行,但是不少已经被年轻一代的马来人摒弃。

【注 释】

[1]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言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2] Mei, Jing. “Pengaliran Antara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Tionghua (马来文和中文的交流)” . *Devan Bahasa*. 1963 (December): 536 - 544.

[3] Abdullah Hassan. “Pertembungan Bahasa dan Kesannya Terhadap Bahasa Melayu (语言接触对马来语的影响)” . *Devan Bahasa*. 1974 (May): 216 - 236.

[4] 杨贵谊:《新客华人克服语文难题的妙方》,《资料与研究》第27期,1997年5月,第39-43页。

[5] 苏庆华:《峇国青云亭条规簿及青云亭同堂会议记录簿中所见闽南方言及音译外来语词汇初探》,《亚洲文化》第15期,1991年,第110-115页。

[6] Masudi Kader, Yeong Ah Lok. “Pengaruh Bahasa Cina dalam Perbendaharaan Kata Bahasa Malaysia (华语对马来语词汇的影响)” . *Devan Bahasa*. 1989 (April): 236 - 267.

[7] 周福泰:《大马华人与巫人的文化交流》,戴小华编《当代马华文存5(8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2年,第220-235页。

[8] 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9] 周长揖、周清海:《新加坡闽南话概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10] Kong, Yuanzhi. “Kata - kata Pinjaman Bahasa Cina Dalam Bahasa Melayu Daripada Dialek Fujian Selatan dan Lainnya (马来语中源自闽南及其他方言的汉语借词)” . *Jurnal Dewan Bahasa*. 1997 (September): 800 - 806.

[11] 同 [3]。

[12] 孔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2年,第112页。

[13] 同 [12],第118页。

[14] Kong, Yuan Zhi. “Kata Pinjaman Bahasa Cina dalam Bahasa Melayu (Bahagian Pertama) (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 . *Jurnal Dewan Bahasa*. 1993 (August): 676 - 702.

[15] 陈应德:《马来语言中源自福建话的借用词》,马《南洋商报》2002年3月30日。

[16] 同 [6]。

[17] 《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马来语百科全书》,Dewan Bahasa, 2005年。

[18] 梅井:《马华词汇的交流》,《南洋文摘》,南洋文摘社,1962年。

[19] 布赛尔著,姚楠、董湘君译《东南亚的华人》,《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期,1958年,第87页。

[20] 孔远志:《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闽南方言借词看闽南华侨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335-354页。

[21] Kong, Yuan Zhi. “Kata - kata Pinjaman Bahasa Cina dalam Bahasa Melayu II (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 II)” . *Jurnal Dewan Bahasa*. 1993 (September): 772 - 795.

[22] 许云樵:《南洋华语礼俗词典》,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1年。

[23] 同 [6]。

[24] 孔远志:《中华、马来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汉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355-366页。

[25]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6页。

【责任编辑:吴宏娟】